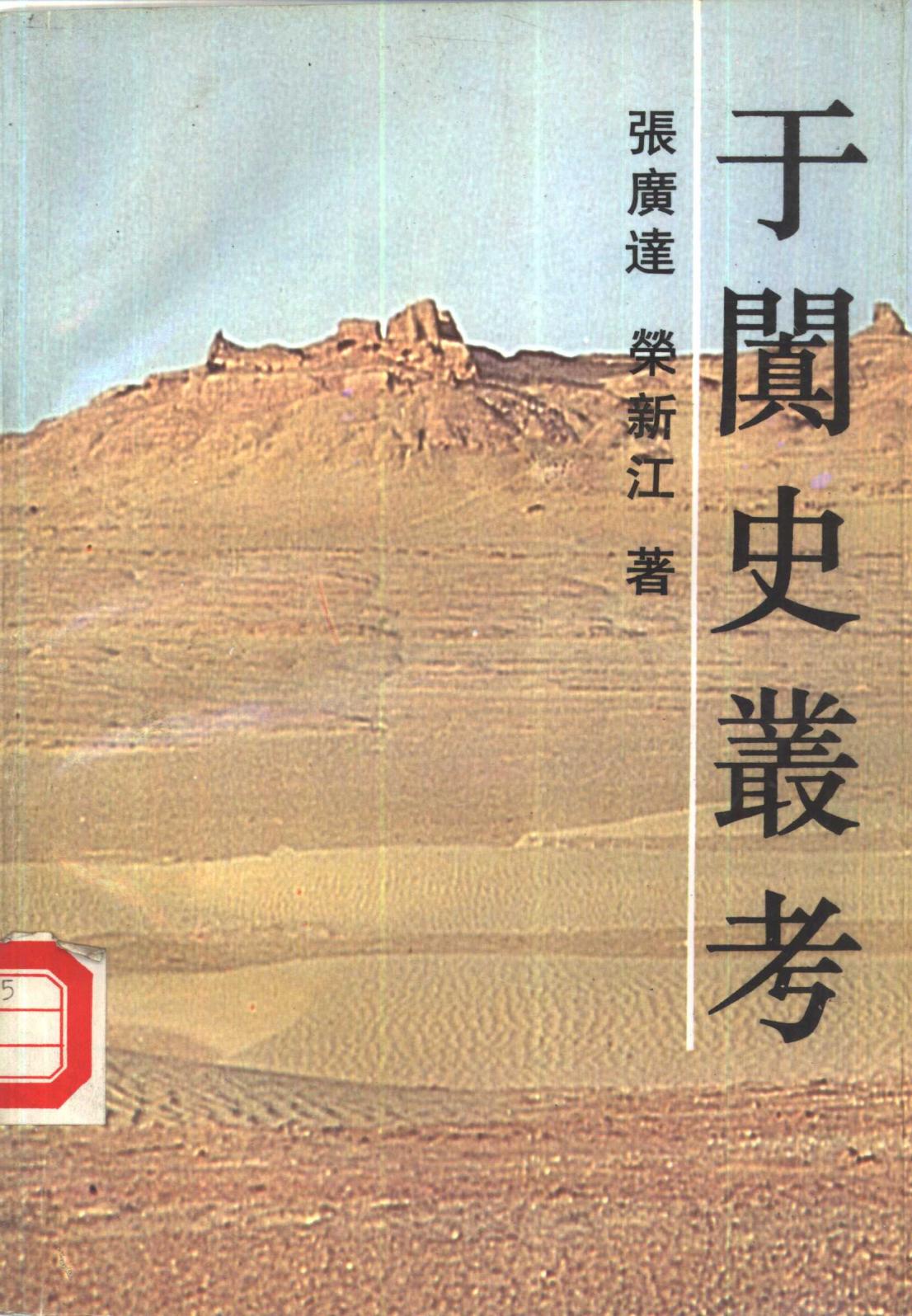


于閨史叢考

張廣達 榮新江 著



# 于闐史叢考

張廣達 榮新江 著

上 海 書 店

責任編輯 楊繼東  
封面設計 柯國富  
版面設計 邵萬生

千 間 史 畫 考  
張廣達 榮新江 著

\*

上海書店出版  
(上海福州路 401 號)  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
中華印刷廠印刷

\*

開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字數270千字 印張11.25

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1—1200

ISBN 7-80569-793-0/K·94

定價：18.00 元

滬新登字 119 號

## 目 錄

上古塞種史若干問題——于闐史叢考序.....	饒宗頤( 1 )
和田、敦煌發現的中古于闐史料概述.....	( 14 )
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、年號及其王家世繫問題.....	( 32 )
敦煌文書 P 3510 (于闐文)《從德太子發願文(擬)》及其年代.....	( 59 )
關於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.....	( 71 )
關於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.....	( 98 )
《唐大曆三年三月典成銘牒》跋.....	( 140 )
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于闐語寫卷目錄初稿.....	( 155 )
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.....	( 191 )
敦煌“瑞像記”、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.....	( 212 )
于闐佛寺志.....	( 280 )
于闐研究論著目錄.....	( 298 )
後記.....	( 354 )

## 上古塞種史若干問題

### ——于闐史叢考序——

今年5月，我應歷史研究所之邀，講述一些古史問題。停滯北京期間，北京大學榮新江兄嘗兩度會晤，承告知他多年以來，和張廣達教授合著有關於闐國論文，即將彙集為《于闐史叢考》，由上海書店出版。他們兩位累歲精力所萃，結合中外史料，對塞語文獻的鑽研，對敦煌新出資料涉及于闐國號、從德太子（Tcūm-ttehi）、使臣各種文書的斷代研究，真是原原本本，殫見洽聞，為佛教史增入若干新葉，填補了許多空白，一向于闐文材料被視為畏途，通過兩位教授的探索，死文字給弄活了。這回的結集，對中古西域史貢獻之鉅，史學界都有口皆碑，無待我來饒舌！

我對於闐史涉獵至淺，承命執筆為序，倍感惶悚，書中重要問題，我無資格參加討論；但看本書講到的“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”問題，而關於在中國境內對遠古塞族名稱的推測，我有一些看法，姑且提出來，向二位先生請教。

### 1. 上古塞種語言文字統稱為“胡書”

和田地區出土的塞種語較于闐語更古老的像托姆舒克（Tum-šuq）、木頭溝（Murtuq）語，都同屬於伊朗語系。于闐語“山”稱ggara-，即 Av.之 gari-，梵語之 giri-；淨土的“淨”，于闐語與托姆舒克語均作 vasuta-，即其一例<sup>①</sup>。語言學的研究證明和田早期居民是塞種，操印歐語系中屬伊朗系東支的塞語（Saka language），而考古學及人類學的發掘其頭骨特徵證明屬於高加索種。在古精

絕國(尼雅)出土的佉盧書文書，其中有不少伊朗語借字，說明塞族語言在這一地區流布之廣。該地區在未經突厥化、伊斯蘭化以前，所有語文，相當複雜，有婆羅謎文、佉盧文、吐火羅文、窣特文、龜茲文、于闐文種種之不同，漢人都籠統地稱為“胡書”。謝靈運說：“胡書者，梵書”，此指 Brahmi。又云：“胡字謂之佉樓書”，即指 Kharosthi (日僧安然《悉曇藏》卷一引)。以後從梁僧祐《出三藏記》的《胡、漢譯經音義同異記》，至隋彥琮的《辯正論》，一概稱之為“胡書”。《水經注》二記龍城云：“河水又東，注於勃澤，即《經》所謂蒲昌海也。水積鄯善之東北，龍城之西南，龍城故姜賴之虛，胡之大國也”。龍城即龍堆，說者謂即樓蘭故地；蒲昌海即今羅布淖爾。黃文弼據姜賴之虛一名推論樓蘭土人必有姜戎，即塞種人之裔胄，甚是。(《西北史地論叢》頁 214)。姜賴之虛，被稱為胡之大國，及胡書之胡，這個“胡”字應該指什麼？是本文所欲探索的焦點。

## 2. 蚌雕白種人頭部記號與西亞 Halaf 相同

本書說道：“公元前八世紀後，塞人逐漸出現於歐亞內陸，約前 650—620 年，以斯基泰為名見稱於希臘史籍，其分支侵入美索不達米亞上游敍利亞”。這是很保守的說法。近年在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銅戟上有白種人特徵的人頭像，陝西扶風周原出土兩件蚌雕白種人頭像，說者認為即希臘史家所說戴尖帽的塞種人，亦有稱之為吐火羅人。<sup>②</sup>最令人矚目的是周原蚌雕像上刻有卍(巫)記號，和西亞五千年前 Halaf 女神肩上的“卍”號完全相同。而“卍”這一符號作為陶器的紋樣在 Halaf 時期屢見不鮮，這一事實我曾撰文指出，引起國際學人的注意，美國梅維恆復加以英譯。<sup>③</sup>遠古時代高加索地區人民與吾華可能有相當接觸。W. B. Henning 所作《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》(1978 年刊)提出：楔形文中經常出現的古提人 (Guti) 就是吐火羅人的前身。他假定公元

前三千年的末期，古提人離開波斯西部，長途跋涉到了中國，仍過着遊牧生活。“月氏”一名最初即源於Guti(Kuci 亦由 Guti 變來)。吐火羅一名源於 Tukri (此名亦見楔形文)，Guti 與 Tukri 是孿生兄弟，是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，他們在波斯的出現先於赫梯人之到達小亞細亞。他這一新說，未為一般學人所接受。<sup>④</sup> 現在我們看“匁”的記號，見於 Halaf 女神肩上，隔二千年後，重新出現在商周之際的塞種人雕像之上，說明高加索塞種在中國地區活動歷史的悠久，月氏和吐火羅(疏勒河南榆泉盆地有地名吐火洛泉，論者以為即 Tochari 的對譯)，都屬於塞種，古代遷徙頻繁，東西互相接觸，自是意中事。

### 3. 從胡里安(Hurrian)文 件看古代東、西的馬政

《魏書·西域傳》：于闐國“有好馬、駝驃”。所以于闐馬錢用馬作花紋，標榜其特產。Hurrian 在世界史上被認為是最早把馬政以及戰車傳入近東的民族。<sup>⑤</sup> 他們建立的米丹尼王國 (Mitanni) 在一件與赫梯王所訂的條約中，記載養馬法及馬拖車的訓練出自米丹尼人 kikkuli，同時用了一些和梵語相同的詞彙，如“一”之 aika-相當於梵文的 eka；又出現若干吠陀的神名，像 Mi-it-ra (即 Mitra)、Aruna (Varuna)，In-da-ra (Indra)，說明 Hurrian 是扮演溝通印歐兩地、聯結伊朗與印度語的重要角色。所以米丹尼被認為是雅利安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的國家。

有人以為中國馬車制度是從西亞傳入的。<sup>⑥</sup> 其實米丹尼馬政記錄的這一赫梯文獻的絕對年代，據說是公元前 1400 年，相當於殷代中期。甲骨刻辭中對於馬名的記錄相當詳細，又有多馬羌、小多馬羌；方國有馬方，官名有馬亞、馬小臣，屢屢言及馬五十兩（如《甲骨文合集》11459），當然指戰車。以馬作為偏旁的契文，有獨、

駒、駕、駿、駁、駢、駘等等，駒字見《說文》，“一曰驥馬黃脊”。駕可讀爲駢，卜辭又有“赤駒”及“駒駒”之名。文云：

“庚戌卜貞：王……于慶，駒駒”。“于馬[方]……駒駒（沿）”（《合集》36836）。駒駒是雙音字馬名，如匈奴稱馬有“駢駢、駒駢”（《逸周書·王會解》：“禹氏駒駢”）、“驥驥”之比。卜辭“爻戊”亦作“學戊”，駒字如讀爲曉母之學（粵語），則“駒駒”可能是梵語 Haya 的對音。Haya 的意思是迅速（Speeding），亦是日神的標幟，所謂 Sapta sūrga 是“七日”之意，如楚辭的羲和爲日御，Haya 表示七個御車的太陽，如吾華的十日。周初“輕呂”（《逸周書·克殷解》）劍名是外來語，人所共知；“駒駒”如果是 Haya，亦相當有趣。《蒙古秘史》：

答驛兒	李羅	豁牙兒	曲驛	阿黑駒	思禿
dair	boro	gojar	külü-güd	ar	tastu
一隻（馬）	一孛羅馬	二隻	駿	驥	馬

蒙語的曲驛兀（Külü）表示駿馬，kikkuli 人名的取義，或與馬有關係。蒙語取自回鶻，字母借粟特文（Sogdian）爲之，源於 Aramaic script。殷代諸羌和塞種人必多有來往，血統不無混雜，印歐語滲入殷人語文，非不可能之事。卜辭對產馬方國及馬名的記載，年代與 Mitanni 正相若，東西兩地的馬政不妨同時發展，並駕齊驅，很難定它的先後，說遠東源於近東，是不必要的。

本書說：“于闐語的 aśśa，意爲馬，和瓦罕語的 Yaś 相同。”按古波斯語“馬”，爲 asa-，正與于闐語 aśśa 爲同一語源。<sup>⑦</sup>

#### 4. 于闐馬錢王號出自波斯傳統模式

于闐通行的馬錢二面皆有文字，一面是漢文曰：“重廿四銖銅錢”，另一面是佉盧文：Maharajasa,rajati najasa, Mahatasa Gu-gramayasa. 意思爲：“大王，王中之王，偉大者：矩伽羅摩耶娑。”（夏

鼐:《和闐馬錢考》。日本學者榎一雄以爲這是模仿大夏國王Eucratides一世(公元前171—155年在位)的鑄幣形式。其實這種“大王，王中之王”的稱呼，是波斯王從蘇美爾以來習用誇大式的最高統治者稱謂套語，試比較如下：

蘇美爾：

Lugal Gal-u	(Great King,
Lugal Lugal meš.	King of kings, 下同。Lugal 卽 king.)

巴比侖：

Šarru rabū  
šar šarrāni

古波斯：

Xšâyaθiya Vazraka  
xšâyaθiya xšâyaθiyânîam

蘇美爾在“大王，王中之王”下面本來還有“Lugal kur,kur,meš”(King of all lands, Kur 卽地, Meš 指多數)一句，于闐沒有很大的版圖，故不用此句，但稱“偉大者”而已。于闐用驢唇書，是印度俗語；因其民屬於塞種，所以仍舊沿襲波斯的稱呼模式。

## 5. “胡”字涵義的演變

“胡”字在歷史上的涵義屢有伸縮、轉移、變遷。西方公元四世紀以降，橫行於歐洲的遊牧部族有 Huns。匈奴與 Huns 不是同族，曾經引起許多討論和質疑。<sup>⑧</sup>陳寅恪在《論五胡問題》中說：“胡本匈奴專名，去 na 著 hu，故音譯曰胡。”印度笈多時期碑銘均稱匈奴爲 Hūna，實有二音。去 na 而僅存首音，是說似不近理。《逸周書·王會解》記西面諸蕃屬有：

禹氏(月氏)駒駘

大夏茲白牛

犬戎文馬

數楚(孔注北戎)每牛

匈奴狡犬

皆北嚮。

此處匈奴與塞種之月氏、大夏區分為不同種屬。《漢書》晉灼注說：“堯時曰葷粥，周曰獫狁，秦曰匈奴。”則匈奴是秦時的名稱。秦以前的文獻，有東胡（《王會解》：“東胡黃羆”），林胡（《史記·廉頗傳》：“李牧破東胡，降林胡”），三胡（《史記·趙世家》索隱：林胡、樓煩、東胡）。胡與貉聯稱（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“其西北則胡、貉、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”），知原來的胡似非專屬匈奴。至秦乃以胡專指匈奴，以匈奴為諸胡中之最強大者。識書言“亡秦者胡”，賈誼《過秦論》：“胡人不敢南下牧馬”，皆指匈奴。而匈奴亦自稱曰胡，如觀狐鹿姑單于致漢武帝書：“南有大漢，北有強胡。胡者，天之驕子也”，可以為證。在中國人方面，則以北胡與南越對稱。東漢高誘云：“中國以鬼神之士（事）曰忌，北胡、南越皆謂之請龍”（《要略訓》注），即其一例，胡遂成為北方異族的統稱。漢代有“秦胡”（居延簡：“屬國秦胡盧水”），指祖居秦地而未融合於漢族的少數異族。<sup>⑨</sup>沮渠蒙遜即盧水胡人，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，以官為氏。高昌有屠兒胡（《吐魯番文書》第6冊）。《北史·高昌傳》云：“文字亦同華夏，兼用胡書，《毛詩》、《論語》雖習讀之，而皆為胡語。”此高昌用胡語讀漢人經典，實為雙語國家，與于闐相同。<sup>⑩</sup>漢簡記有月支國胡支桂，年廿九，黑色，是分明非漢族而為支姓者。晉有支胡官印（上海博物館藏“晉支胡率善仟長”印）。《後漢書·西羌傳》：“湟中月氏胡，其先大月氏之別也。”同書《鄧訓傳》：“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，……每與羌戰。”則小月支亦稱為胡，以其曾臣屬匈奴之故。<sup>⑪</sup>

唐代，藏人專稱粟特為胡，見 P. T. 1263 藏漢對照字彙，藏文

作 Sog. po, 首音分明是粟, 或謂即西胡。<sup>⑫</sup>至十三世紀, Sog. po 用以指蒙古族, 有人謂是“阻卜”的對音。

可見胡字涵義廣狹及轉變的大概。以胡代表西北異族的通名, 遠至粟特, 近及高昌皆然, 于闐自然亦包括在內, 故其言語文字亦可稱為胡書。

大家都知胡名出於匈奴, 匈奴且自稱為胡, 但何以有這一名稱? 需要進一步加以解答。

## 6. 虫、Hor 與 Hrw

由於于闐一帶先民頭骨多為高加索人, 令人聯想到遠古的白色人種。

周原甲骨 H. 11. 2 有“虫白(伯)”一名, 有人釋蟲, 讀為崇伯, 是不對的: 虫應是虺, 滐通作隗, 隗姓在春秋時被稱為懷姓九宗, 史稱“陸終娶鬼方氏女”, 他們是鬼方之族,<sup>⑬</sup> 王國維久已提出此說, 人所共悉。虫、虺與懷、隗都與胡音相近。

在西藏北部及西北部地區, 至今散居着許多被稱為 Hor 的遊牧民族。Hor 系藏文寫法, 在 P. T. 216 號《藏漢對照字匯》中, 對回紇人稱 Hor, 但在 P. 2762 中則以 Dru-gu 稱回紇人, 最早記載見於 662 年。<sup>⑭</sup> 有人謂 Hor 是秦漢小月支之苗裔, 亦有說宜改譯為畏兀兒。<sup>⑮</sup> 我則認為 Hor, 實在應是“胡”字的音譯在西北保存下來的殘跡。Hrw 在《聖經》上稱為 Horite。

Hurrian (胡里安人) 建立的米丹尼王國在埃及歷史上被目為雅利安民族 (Aryan race), 他們的原住地在烏滸河 (Qxus) 和藥殺水 (Jaxartes R.) 源東北部山地之後面。米丹尼語言的影響向西擴展至奧倫特河谷 (Orontes Valley), 更東至尼尼微 (Nineveh)。他們形成一個有力而文化優越的國家, 從她的異邦喀斯特 (Kassite) 王朝統治下的巴比倫沿幼發拉底河 (Euphrates) 迤西促成商業

的成長與繁榮。<sup>⑯</sup> 馬的訓練法影響最大，在哈杜沙什(Hattusas)地方(即赫梯人 Bogás-Köy 村遺址)<sup>⑰</sup> 所出的文書，證明他們是人類文化上馬和戰車事業最大的貢獻者。Hurrian 在埃及文獻原稱為 Hrw(Hur)，在楔形文史料出現於 Mari 區域所見的稱 Hur-lili。我認為 Hrw,Hur 即是“胡”這一名稱的來源。

北方諸胡都是騎馬民族，對馬不能不加以重視與崇拜，于闐亦不能例外，他們的錢幣即用馬作為標幟。匈奴所以自稱為胡，可能即取自此以養馬聞於世的 Hrw,Hur 之名。匈奴的前身據說是獯育，相傳為黃帝所逐(《史記·五帝紀》：“北逐葦粥，合符釜山”)。《史記·匈奴傳》：“唐虞以上有山戎、獮狁、葦粥，居于北蠻，隨畜牧而轉移”。《詩》言“薄伐獮狁”，不要篡作“厥僂”，僂即允，字從女。《左傳》：“允姓之姦”，“允姓”自是厥允之省稱。多友鼎記“獮狁放牘，廣伐京自”，“俘戎車百乘十又七乘”，是一場很重要的戰役。匈奴、獮允的種別異名很多，《詩經·麟》：“混夷駢矣”，混夷即緜戎。《匈奴傳》記“秦穆公得由余，西戎八國服於秦，故自隴以西，有麟諸、緜戎翟獮之戎”。顏師古《漢書》注：“混，夷也”。按混、緜亦可能是 Hur (Hrw) 的對音。漢代秦地的胡廣泛分布於河西走廊、青海，東至河北平原，由於秦穆的開拓土宇，分散為若干部落，到了漢代還保留着“秦胡”的稱謂。

Hrw 在 Amarna 信件中稱為 Hurrū-he,或 Hurwū-he。他處或稱 Hurri,Hurra，意義是洞穴，原意可能指穴居的人。

## 7. 塞種與瓜州之戎

塞種(Saka)之名西方文獻始見於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(公元前 521—486 年在位，相當周景王二十四年至周敬王三十四年) Achaemenids 的 Behistam 碑文。漢代記載塞種更為具體。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：“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，自疏勒以西北，休循、捐毒之

國皆塞種也”。從希臘史家之說，知波斯人泛稱之爲“Scythians saka”。在高加索地區，Scythian 語言有 Ossetic 者，今日仍爲人所使用。塞種人的活動地帶跨有歐陸，已爲史家共認之事實。

《左傳》昭九年記晉人率陰戎伐潁，周王責讓之，謂“先王居檮杌（凶人）於四裔以御螭魅，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，至晉惠公夷吾自秦歸國，誘以俱來”。杜預注陰戎是陸渾之戎。僖二十二年傳：“秦、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”，即是此事。在襄十四年傳記晉惠公賜姜戎以可耕的田地之經過，十分詳細。結合《左傳》這三條材料，細心勘校，實在是同一樁事。楊氏《左傳注》把允姓與姜姓分爲二姓，指杜注誤混，其說不確，因彼等同爲晉惠公所徙之戎，不應強分爲二。《史記·秦本紀》載穆公三十七年（公元前 623）用由余之計伐諸戎，益國十二，拓地千里。晉惠公擣姜戎東遷，即在是時。襄十四年傳云：

（晉人）將執戎子駒支，范宣子親數諸朝，曰：“來！姜戎氏。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於瓜州，乃祖吾離……來歸我先君。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，與女剖分而食之。”

勘以昭九年傳：

允姓之姦居於瓜州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，使逼我諸姬，入我郊甸，則戎焉取之。戎有中國，誰之咎也？

可見同屬瓜州之戎，雖一稱姜戎氏，一稱允姓，仍是一事。

荀濟《論佛教表》引《漢書·西域傳》之文云：“塞種本允姓之戎，世居敦煌，爲月氏追逐，遂往葱嶺南奔”。他認爲允姓即是塞種，必有根據。《水經注》二：河水“一源西出捐毒之國，葱嶺之上，西去休循二百餘里，皆故塞種也”（說本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）。徐松《補注》引顏師古注塞種即釋種。《元和姓纂》云：塞姓，天竺胡人之釋徒，即塞姓也。荀濟之說，徐松引用之。《後漢書·西羌傳》：“自燒當至漁良，世居河北大允谷”。《水經注》二記積石之山在西羌之

中，燒當所居也。引司馬彪曰：“西羌者，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，左右居也”。大允谷當因允姓所居而得名。余太山新說以爲允姓是 Asii(希羅多得作 Issedone)的對譯，塞人有四種屬，其中 Asii 和 Tochari 卽允姓和大夏(《塞種史研究》)。按秦人追逐的瓜州一帶諸戎，名目繁多，是否都是塞種，尚無確證。《詩經》所載文王時的混夷即秦穆時的緹戎，不成問題；“混夷”和 Hrw 對音頗合。姜戎之祖吾離，如果是種族名，似可把“吾離”視爲“胡里” Hurri 的對譯。Mitanni 文件說明 Hur 王國在歐、印文明聯繫上的重要地位，時代與殷中葉相當。“胡”的名號在先秦後期已甚通行，可能“胡”一名先時即取自 Hrw 的王國，以通指塞種諸戎，漢人襲用之，故“胡語”亦得通指塞種各種語言。鄯善龍城的姜賴之墟爲姜戎舊地，亦得被目爲胡之大國。我這一說，也許比較視胡作爲匈奴廣泛的異稱，更爲近實。至於周原蚌雕白種人，如果以文王時代的混夷目之，較之看作吐火羅人或廣泛的塞種人，似乎更加貼切了。

## 餘論

殷周之際的西北勁敵，混夷可代表塞種，還有羌戎，是代表藏語系的民族。允姓之允，我以爲是獮狁的“狁”字之異寫，兮甲盤、虢季子白盤作“厥狁”，不婁盤作“厥允”，“允”即“厥允”的簡稱，《西羌傳》之大允谷，即取允姓爲名，足見“允姓”不能說是 Asii 的對譯。襄十四年傳分明說道：“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，贊幣不通，言語不達”，可見其非印歐語系的人種莫屬。至於同時何以復稱之爲姜戎者，必其族久已和羌人混血成爲雜種，像殷時有馬方，又有東方羌及小多馬羌(卜辭云：“乎小馬羌臣”，《合集》57176)，當即羌與馬方的混合。多馬羌復有小多馬羌，亦如月氏之有小月氏。姜(羌)戎從瓜州的內遷，和後來小月氏的內遷一樣。《史記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》，侯國驪茲，是小月氏若苴王稽谷姑封此。《索隱》曰：

在琅邪。輒攝爲小月氏王扞者封邑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“河東有狐讐故城。”以後况前，種族遷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。

《水經注》四〇三危山引《春秋傳》語，又云：杜林曰：“燉煌，古瓜州也，……瓜州之戎，并于月氏者也。”闢駁《十三洲志》亦云：“瓜州之戎，爲月氏所逐”（《太平寰宇記》引）。則古明有此說。月氏，《管子·地數篇》音借作“牛氏”，管子屢次言及玉起於禹氏（月支）之邊山，去周七千八百里。殷婦好墓所出玉器多件，現已證明其玉料均來自于闐所產，有人取突厥語玉名 qāsch，以解釋“月氏”，謂月氏即是玉之譯名。于闐與月氏有不可分之關係，於茲可見。《水經注》二：于闐南山，俗謂之“仇摩置，山多玉石”，仇摩置亦作瞿摩帝，梵名 Gomati。又于闐梵名 Gostana（瞿薩旦那），本書考證牛頭山于闐文拼法是 Cūtausänä,go 與 co 都是“牛”，“說明最早的一批居民對牛的重視和崇拜，或許透露遷徙而來的塞人對牲畜的重視”。其實對牛的崇拜原爲印度的習俗，印度造字的聖人號 Govinda（瞿頻陀），意義是 Obtainer of go/(牛)，<sup>⑩</sup> Go stana 訓牛國，這完全是印度化的結果，附帶說明於此。

上面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，趁本書的印行，略抒所見，願治中外關係的同好有以匡正之。

饒宗頤

1992年6月11日於香港，7月18日改訂

① 參看 R. E. Emmerick: Saka grammatical Studies: The Language 章。

② 參看林梅村文：Lin Mei-cun, Tocharian people: Silk Road Pioneers,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, no. 32, P 91.

③ 見 Sino-Platonic Papers, No.26, “Questions o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Raised by the Silk Road”, by Jao Tsung-i, University

of Pennsylvania, Philadelphia, 1991.

④ 參看徐文堪：《從一件婆羅謎字帛書談我國古代的印歐語和印歐人》（《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》頁373—403），對 Henning 之說的贊揚者與反對者，都有所論列。

⑤ Hurrian 民族歷史，在埃及、赫梯史籍中多有記載。漢譯史書，以謝德風等所譯捷克有名學者 B.Hrozny (赫羅茲尼) 的《西亞細亞、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》(三聯書店，1958年)一書最為詳盡。參看該書頁146—151討論米丹尼為雅利安人所建之王國。

⑥ 美國夏含夷教授 (Edward L. Shaughnessy) 在他的中文本《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》(臺灣《漢學研究》第7卷第1期) 卽主張馬車是由兩河文化輸入的。他沒有提到 Mitanni 這一有名的文件。他從 Piggott 的文章轉引赫梯 (Hittite) 的材料，最早的有關文獻是公元前1700年前後記載了安納托利亞 (Anatolia) 王動用四十輛馬車作戰，他說里海的車子比殷鑄的車早三百年至五百年。他統計漢文資料，指出甲骨文中 (《平津》2, 212) 只言擒獲了兩輛車，(原文是“……內車二內”)，證明此時馬車還沒有成為作戰主力。又引《左傳》昭公十三年，有車四千乘；昭五年，馬車總數達到四千九百輛之多。又據多友鼎記玀狁戰役，一百二十七輛馬車被繳獲，標誌着要到公元前九世紀後半中國才進入戰車成熟的時代。這種粗略的統計很有商榷的餘地：甲骨文“內”字可用於車若內，同時亦用於馬若干內，內殆是“兩”字異形 (金文大簋作“𠂔”，內為省形。卜辭“內”亦作數字用，如“東內半用”(《合集》11364)，以他辭“其鼎(卣)用三半(《合集》30997)證之，“內”即“兩”甚明，借“兩”為“輛”，非丙字。) “馬……內”可以解作馬車若干兩，“馬五十內”的記載卜辭屢見，我認為應該釋為馬車五十輛。《逸周書·世俘解》云：

乙巳，陳本命新荒蜀瘳至，告禽翟侯、艾侯，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，禽翟八百有三兩，告以馘俘(用唐大沛《分編句釋》本，引張惠言說：“大臣不當以兩計，禦蓋謂車)。

當日單就翟、艾兩個侯國，便擒獲八百三輛戰車。《呂覽·簡選》：“殷湯良車七十乘，必死六千人，戰于鄖。”以此證之，卜辭的馬五十內，即馬車五十兩。夏氏沒有引用《逸周書》，大概認為不可靠，這裏的擒八百零三輛的數字，已可與埃及在 Megidan 之役俘獲 894 輛相媲美。又夏氏引昭五年左傳，原文無

之，或出誤記；昭十三年傳，原文是這樣的：“七月丙寅，治兵于邾南，甲車四千乘，……遂合諸侯於平丘”。證之以春秋經，乃是魯國的兵車數字，不是如夏氏所說“晉一次閱兵時集中的馬車數字”。春秋時，有萬乘之國、千乘之國（《孟子》已言之），很難拿來作統計依據的。因為此文關係重大，承夏氏郵贈，故附帶在此加以討論。

⑦ 參 R.G.Kent: Old Persian: Lexicon, P.173, asa-條，又 Asagarta-, asabāya 各條。

⑧ 見余太山《匈奴、Huns同族論質疑》，《塞種史研究》，頁 242。

⑨ 趙永復考證，秦胡亦即秦人，見《兩漢時期的秦人》，《歷史地理》第 9 期。

⑩ 參黃烈《談漢唐西域四個古文化區漢文的流行》，中山大學《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》頁 414。

⑪ 參黃盛璋：《雜胡官印考》，《西北史地》1986 年第 4 期。

⑫ 王堯《吐蕃簡牘綜錄》，頁 28，粟特條。

⑬ 王暉《“虫伯”及其種族地望考》，史念海編《歷史地理論叢》，1990 年，第 2 期。

⑭ 王堯《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》新版，1992 年，頁 179；又參森安孝夫：《突厥與霍爾 (Hor)》，《亞非語言文化研究》14 集，1977 年。

⑮ 韓儒林《穹廬集》，頁 91，《烏鵲、Huiur 及 Hor》引美國 J.H.Edgar 說，謂即秦漢小月支之苗裔。

⑯ 參看 J.H.Breasted: A History of Egypt, P.263 及同書有關 Mitanni 各條。

⑰ John Garstang & O.R.Gurney: The Geography of the Hittite Empire, London, 1959, Ankara 考古學研究所印行。

⑱ 參拙作《選堂集林》下冊，頁 1442。